

第 一 章

辛亥革命前后泰安的社会状况

泰安地处山东中部，它北依省会济南，西靠黄河，东邻莱芜、淄博市和临沂地区，南与济宁市相接。这里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5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泰安又以五岳独尊的泰山闻名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有不少曾来封禅泰山，从而使泰安成为山东的一座历史名城。汉初设泰安郡，金元时期设泰安州，清代后期设泰安府。千百年来，封建贵族、地主富豪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遭受着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奴役和剥削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到了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泰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残酷的封建统治的重负之下，又雪上加霜，陷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中。

第一节 泰安的社会政治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此后几十年间，法、日、俄、德、美等帝国主

义相继侵入，1900年发展为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并两次占领北京。这期间，腐败软弱的清朝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地、赔款，并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到了通商、传教、驻军和开矿、建厂的种种特权。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由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当时的山东，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首要地区。19世纪60年代，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相继在登州（后改为烟台）建立了领事馆，向内地大量输入商品，进行经济侵略。还派大批传教士到内地传教，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泰安地区各县陆续建起了教堂。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争相瓜分中国。山东划为德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由商品输出逐渐转向资本输出，德、英等国先后在山东开办工厂、商行、公司20余处。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别是对山东的经济掠夺，德国于1899至1904年修筑了胶济铁路；继之，德、英帝国主义于1908至1912年修筑了途经泰安的津浦铁路。德国在签署了修筑津浦铁路的合同后，提出独霸该铁路沿线30华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无理要求封闭泰安地区大汶口、磁窑等地华人开采的煤矿，在中国民众坚决反对下未

北京在1928年6月被改名为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恢复北京原名。

能得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中国的各级官府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经济劫掠和殖民压迫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一方面，清朝政府为了向帝国主义交纳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大量赔款，频频向民众摊派银两，在原有税捐已十分沉重的基础上，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攫取的自由贸易权，向中国大量倾销以棉货（洋布、洋纱）为主的工业品，致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操纵控制市场物价，掠夺工业原料，当时在泰安、大汶口等地，经常有德、日等国商人来抢购棉花、花生等农产品。他们利用所控制的铁路，为其经济侵略服务；利用他们在中国开办的工厂、矿山，掠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矿产资源，其产品充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民族经济。地处鲁中的泰安各县人民深受其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萌芽中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人民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困苦。

外国势力在中国横行不法，干涉地方行政，通过地方官府对人民实行殖民压迫。百姓一旦反抗，清政府则在外国公使胁迫下，屈从、偏袒外国人，以中国平民遭受屈辱而告终。当时外国的教会势力统治着地方，传教士利用教会特权，任意欺压平民，并唆使其教民（有不少是地痞流氓）横行乡里，欺诈百姓，从而激起平民的极大愤慨。泰安西部各县都成立了大刀会、义和团，反对洋教，各地

“教案”不断发生。1899年12月，肥城等县的几名大刀会成员怒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杀死。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指名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推荐崇洋媚外的袁世凯来山东署理巡抚，屈从于洋人的清政府被迫照办。袁世凯上任后，即派官兵镇压大刀会，设法抓获了孟广文、吴方成、吴经民等数人。下令将2人判处死刑，1人终身监禁；把泰安知府和肥城、平阴两县令革职；肥城县还被迫赔偿教会白银9000两，另给白银500两为卜克斯立碑，割地5亩建教堂一处。这就是轰动全省的“肥城教案”。外国的非教会人员也横行霸道，甚至任意枪杀平民。同年10月，德国矿师福时代带领德兵2人驱车在泰安县东向村（今属肥城市）撞翻了平民的粮车，两平民上前与他们评理。福时代与德兵不由分说，向2人开枪，当场打死1人，打伤1人。3个德国人扬长而去，满清地方官府竟不敢究问。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于1912年1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其胜利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3个月后，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力下被迫辞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在北京

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府。此后的十几年间，中国政局动荡，各派系军阀依附帝国主义相互混战，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

这一时期，泰安地区各县一直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从 1912 年民国建立，到 1928 年国民党北伐控制山东的 16 年间，北洋政府在山东先后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泰安地区各县官员也更迭频繁。这些官僚政客为了效命于卖国的北洋政府和挥霍自肥，与劣绅相勾结，对人民极尽搜刮敲诈之能事，加之军阀混战，匪患四起，泰安人民灾难深重。

民国建立第二年，北洋政府就下令各地验契，清查田赋，以增加捐税、搜刮人民。各县为此设局办理，历时 3 年之久。在验契过程中，各县官府劣绅勾结，借机增加捐税，对人民横征暴敛，百姓深受其害，致使矛盾激化。莱芜、肥城先后发生农民聚众反对官绅借机贪污肥私和砸“丈量局”事件。这段时间，贪官冯汝骥任泰安县知事。他依仗权势，敲诈盘剥人民，巧立名目，随意增加房捐，侵吞救灾款项，中饱私囊。仅在泰安城更换房契一项中，他就从居民手中搜刮了几十万现大洋，城乡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泰安人民愤恨地编了一首民谣，揭露他在泰安的罪行：

冯汝骥，坐泰安，土地加税房加捐。

腊月里，冰雪天，地保衙役都催钱。

交钱日期不准变，到期不交把眼剜。

肚里无食身发抖，城里乡里哭连天。

冯去职后，泰安人民于 1917 年给他铸造了一个生铁跪像，身上挂满了洋钱，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愤恨。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各级官府的税捐有增无减，名目繁多。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将原征地丁银、漕粮改称田赋，把杂税项目归并一起统征银元。在田赋基础上，省里又设立了 10 余种附捐，府、县、区也巧立名目层层附加。当时泰安各县设立的附捐达十几种之多，有民团捐、交通捐、讨赤捐、壮丁捐、军械捐、河工捐、招待捐、地方自治捐等。后来愈来愈多，又设了劳军捐、电话捐、剿匪捐、契纸捐、会捐、酒斤捐，另外还有名目众多的工商税等等。从民国初年到 1926 年，肥城县的地丁银及租课银增长到原来的 4 倍，新泰县的附捐增至原来的 5 倍，一个中农每年要拿出 2/3 的收入交纳正税和杂捐。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地方上兵来将往，人民还要支应军队的临时摊派，有时数目巨大，一次上交数要顶一年甚至几年的附捐。又兼货币发行混乱，军阀部队发行的“军用票”充斥市场，私商发行的杂钞种类繁多。市场物价飞涨，这也对人民生活产生着灾难性影响。1925 年 4 月，北洋军阀委任奉系军阀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部分武装驻守泰安。张宗昌除对人民课以沉重的捐税外，还发明了一个更为毒辣的捐税征收办法，即当年预征第二年、第三年的捐税。他在山东统治 3 年多时间，对泰安人民预征了 10 多年的捐税，把大多数泰安人民推向破产、贫困和无法生存的境地。泰安城一位爱国学者在他

1927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本年钱粮已完两次，刻闻有二万元尚未结束。近又电催征解加赋，每银一两折大洋八元。剥削之苦向所未有，肉已尽而割不止，思之悚然。”^①

由于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各地土匪蜂起，横行乡里。从民国建立到1928年，泰安地区仅肥城、东平、新泰、宁阳、莱芜5县，有记载的大股土匪抢掠就达20余起，小股骚扰更不计其数。1918年，曹州一带的土匪范炳鑫率众攻入肥城县城，砸了县署，当铺、盐店均遭洗劫。同年，匪军一支自曹州、汶上一路烧杀抢掠奸淫，窜至新泰，围攻打开了小协村，杀死村民83人，另有22名赶集的百姓也被打死。鲁中一带的大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经常率部在新泰、莱芜、宁阳等县抢掠。1914年6月，刘部劫掠莱芜口镇，抢走巡警枪械及商家农户数十万元；1927年4月，刘部5000余人占据莱芜碁山观一带20余个村庄烧杀抢掠，百姓聚集于鸿福山寨据险抵抗，最后弹尽粮绝被匪攻陷山寨，百姓死398人，伤153人，20余人被掳走无一生还。当时的军阀政府，虽收了民众的剿匪捐，但对土匪却打击不力，其军阀部队，军纪败坏，形同土匪，有的兵匪一家为害百姓。1918年4月，土匪张台元率七八百人攻破东平县城，驻城军阀部队何锋钰哗变，与土匪一起在县城西、南部抢掠。1926年6月，张宗昌招募的白俄军应泰安府之请，

^①《泰山区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9页（泰安市泰山区政协文史委1989年1月编印）

赴沂蒙山区“剿匪”，路经新泰汶南镇李家楼，百姓关闭寨门。白俄兵竟诬称李家楼是匪窝，强行攻村，打死村民 7 人，伤 13 人，将全村抢劫一空。驻泰安城的军阀部队更是无恶不作。城内居民的房屋被强征作军营的不计其数，惨无人道的士兵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搜查“匪人”为名，闯入民宅，调戏、强奸青年妇女。加之各地水、旱、虫、病等灾害经常肆虐流行，官府治理不力，人民群众更加贫困，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城乡人口锐减，一片萧条景象。

第二节 泰安的社会经济

泰安地区的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全区以农业为主，明、清以来商业和简单的手工业及加工业有所发展。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束缚下，特别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和战乱的影响下，虽然中部有膏腴之地汶阳田，西部有宽阔的东平湖，东部有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并有大运河东西贯通全境，但全区的社会经济却发展缓慢，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

在长期封建剥削制度下，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破产沦为佃农或贫雇农，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这种现象泰安西部最为严重，有不少地主占地千余亩或二三千亩，有的人均五六百亩，东平、肥城等县都有号称“八大家”的一批富户。东部各县土地集中程度虽不及西部地区，但每户地主拥有土地也多达二三百亩，

一般为四五十亩。全区地主平均每户占地 49.8 亩，人均占地 8 亩，而贫雇农平均每人仅占地 1 亩左右，贫富悬殊甚大。

由于贫富不均，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业经济中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和剥削手段。在土地经营方面，地主主要靠雇工或租佃经营，富农是半雇工半自耕经营，中农为自耕经营，大量的贫苦农民除耕种自己的少量土地外，主要靠给地主富农当雇工或租佃土地维持生计。伴随以上经营方式，出现了雇工、出租、放债等多种剥削形式。雇工分长工、季节工、短工等，是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的重要方式。他们拼死为地主干活，有时还遭到训斥、打骂，得到的工钱却很微薄。一个长工，按等级每年得 500 至 1000 斤粮食（粮色是粗、细各半或六、四搭配。下同）；一个短工一般每天仅得粮食 3 至 5 斤。地主出租土地方式有包租制、分租制、定租制等若干种，收租办法有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不论哪种方式，总是地主得大头，佃户得小头。如地主只出租土地，一切生产费用由佃户负担，收获时最低对半分，有的地主得六成；如地主投入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佃户只出劳动力或部分工具，则地主主要独得收入的七成到八成以上；如实行定租制，则不论年成好坏，佃户都要交纳固定的地租。佃户劳作一年，往往交上租子所剩无几，遇到歉年，交不上租子就会债台高筑。地主剥削的又一种主要方式是放债，多为放粮，有的也高利放钱。穷人借粮，一般是春借一斗，夏还二斗或一斗

半；有的是春借一升谷子或玉米，夏还一升麦子。借钱一般月息 3 至 5 分，到期还不上，便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许多农民欠债无力偿还被迫以土地和财产作抵押，有不少因无力赎回而失去土地，沦为赤贫。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使贫苦农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倾家荡产者，逃荒要饭者比比皆是，有的活活饿死，暴尸街头。这种土地制度和社会状况，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贫苦农民无力增加农业投入，中农户也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歉年就有破产之可能。加之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人力和畜力耕种，不注意也无力创造和改善水利等生产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更谈不上科学种植。因此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产量很低。正常年景一般亩产 100 斤左右，好的县份和地区也仅产一百三四十斤，致使农业经济在落后的状态下停滞不前，造成农民群众长期贫困不得温饱。

泰安地区的工商业素不发达。近代以来，各地仅发展起一些酿造、榨油、编织、砖瓦、铁木器、造纸、制陶、制革、缫丝、织布等手工作坊。作坊资金和生产资料全为私有，除大地主经营的酒店、油坊或商号等规模稍大外，大多数规模很小，师徒传艺，手工操作。有的招收些雇工，少者数人，多者十几人不等。经营方式多为前店铺后作坊，产品自产自销，亦工亦商，有一些还仅是家庭副业或者亦工亦农。虽为手工操作，但聪明的泰安人也生产出一些著名产品。如新泰县编织的“浮丘白”草帽辫，在民国初年曾

销往全省及东北，并出口日本。莱芜县工匠制作的锡雕香炉，1915年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牌奖。宁阳的“桥酒”在1914年的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博览会上获奖。泰安县的造纸“尚称发达，每年出产除供给本县外，尚能行销外县”。但“其抄造工艺均系锅煮料，碾轧浆，手工抄造，日光晒干”。^①当时仅能生产黄表纸、草纸、毛头纸等几种产品。民国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加之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境内的泰安、东平、新泰、莱芜等县，曾开办了部分使用机械或半机械的近代化的面粉厂、电灯公司、织布厂、缫丝厂、印刷厂等。其中泰安的织布厂（即平民工厂）和莱芜的印刷厂等为官办，其余为私营，有的是外地人来投资兴办。这是泰安地区兴起的第一批近代化民族工业，但规模都不大。由于军阀混战，兵匪为患，税捐重多，农民破产等，经营困难，东平的面粉厂、电灯公司、织布厂等都在创办不久即停业倒闭。

在落后的工业状况下，商业亦十分落后。清末时期，泰安交通不便，庶民轻商，城内商号仅18处，业务活动仅以本地自销为主。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后，泰安私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境内外货物得以调节。1924年前后一度兴盛，泰城、大汶口达近千家，从业者数千人。此后战乱

^①《泰山区文史资料》第二辑第54、55页（泰安市泰山区政协文史委1990年7月编印）。

迭起，商业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西部的东平地区，近代假运河舟楫之便，商业比较兴盛，晋、陕及省内周村、淄博一些客商先后到县城开设商号、钱庄等。境内生产的粮食、烟叶等农产品得以销往外地，济南、周村的绸缎、布匹、鞋帽以及上海、镇江等地的蔗糖、大米、竹器、煤油、纸张等被贩往境内销售。1902年后，由于运河淤塞，航运停滞，东平境内店铺歇业，外地商号抽走资金，商业日趋萧条。

这一时期泰安的工商业在全区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人数而言，各县做工经商者除泰安县稍多以外，其他县一般各在 2000 人左右，占总人口的 3% 到 4%。在近代工业发展困难、规模极小的情况下，未能形成作为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随着泰安铁路的兴建和煤炭开采的近代化，使泰安地区形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雏形。

津浦铁路在 1912 年建成通车后，山东路段有铁路工人 1000 余人。泰安车站属于较大的火车站之一，并逐渐扩大了工务、机务、车务等铁路单位，另外还有大汶口、磁窑等一些小站，估计有工人 100 名左右。

在泰安东部地区，很早以前已有了民间采煤业。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矿业的兴起，新泰、莱芜和泰安、宁阳东部地区的煤炭开采业

《山东工人运动史》第 51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9 月出版）。

《济南铁路分局志》第 361 页（中国铁道出版社，1994 年 7 月出版）。

有较快发展，到 1910 年已有煤矿 50 余家，产量达 30 余万吨，有矿工数千。民国以后又进一步发展，矿工队伍也有所扩大。各煤矿的经营分多种情况：一种是民间集股开办，多为小煤井，如“份子窑”、“三姓矿”等；一种是地主、商人兴办，如济宁的官僚地主米献臣（米汝厚）与华丰地主魏以坤 1909 年开办的“华丰煤矿”；日照商人丁仲范 1921 年在孙村与别人合作开办的“保太公司”；一种是官僚开办，如清政府官员赵尔萃 1907 年出资在孙村参与开办的“官字号”，军阀张勋等 1911 年强占禹村的“三姓矿”开办了“泰安县华宝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17 年经山东军阀政府批准该公司改为商办。当时煤矿开采的条件十分落后，完全以镐、锤、钎等进行人工开采，以人力从巷道中向外驮运，提升用人力或畜力绞车，产量很低。随着煤矿开采业的发展，部分矿井的生产实现近代化，1917 年和 1921 年，禹村“华宝公司”和孙村“保太公司”分别使用汽绞车提升，保太公司还装配了机械抽水泵，产量进一步提高，雇佣工人多达 500 至 800 人，有的煤矿达到 1000 人以上。这可以说是泰安矿区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队伍，总计也不过数千人。

矿工的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一部分系从外地招来的贫苦农民，大部分是当地农民，而当地矿工多系亦工亦农性质，农忙时务农种地，农闲时下矿干工。工人们在矿上遭受着资本家和窑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一是劳动时间长，工人常常工作 16 小时，有的干

24 小时，而且无星期天、节假日。二是工资特别低，有的工人一天挣得仅能自己填饱肚子，难以养家糊口。三是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当时矿工中流传的“油灯闪闪口边含，爬行地狱汗如泉；窑主家家金万贯，‘窑伙’户户愁油盐”歌谣即可证明。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矿井经常发生事故，造成大批工人死亡。四是遭受野蛮的剥削和统治，矿内实行封建把头、包工柜制度，设有护矿队，工人无人身自由，并遭受大小把头的层层盘剥。主要方法有罚款勒索、放高利贷、勒逼送礼、扣工资、发煤抵钱、设赌场等。矿工被榨尽血汗，生活十分悲惨，大多数头枕半头砖，身披麻袋片，井下光身赤脚，以高粱面和野菜充饥，病累饿死者甚多。遭受重重压迫和剥削的煤矿工人，对资本家和旧社会充满着无比的愤恨，在他们中间潜存着强烈的反抗旧世界的信念。

第三节 泰安的文化教育和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上一个世纪与文化落后的地区相比较泰安地区的文化教育尚称发达。清末时期各县设私塾少者 200 余处多者四五百处，还有高一层次的书院、儒学等。对学生进行的是《修身》读《经》讲《经》之类的封建科举教育，读书者绝大多数是富家子弟。1905 年，各地按照清政府诏令，废科举、兴新学，境内开始设立官办小学、中学、师范等。到民国初，全区小学发展到 920 余处，泰安城还建有省立

第三中学、泰安师范和 3 处教会中学。到 1919 年,全地区有小学 1135 处,其中有高等小学数 10 处,私塾 1178 处,中学 5 处,师范 1 处,各县还建起了师范讲习所(科)。这时,小学在校生虽达 1.4 万余人,但入学率仅为学龄儿童的 14.4%。1921 年,国民政府提倡“普及国民教育”,学生虽有增加,但学龄儿童入学率也仅到 19%。在贫困动荡的社会条件下,80%以上的青少年仍不能入校学习。

泰安地区社会文化教育的初步发展,对接受和传播民主文化思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实行新学之后,教学内容从民国起逐步取消了读《经》讲《经》,除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课以外,又增加了理化、外语等课程,原设的《修身》课也改为《社会》、《公民》或《三民主义》内容。当时的教育,尽管仍是为了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但学生在学校能学习到一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能通过多种途径受到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和教育。泰安知名教育家范明枢于 1905 至 1907 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笃信教育救国。他回国后,与进步教育家王价蕃共同创办了泰安教育图书社、劝学所、公立学堂,并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孔孟之乡创办了泰安女子小学。在改革旧的教育方法的同时,注意向学生传授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反清、民主等进步思想,对启迪民智、推动民主与新文化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 10 多年中,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文

化虽与封建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遭到惨败。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工人队伍的逐步增大，在中国人民中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特权政治和军阀独裁，提倡政治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是这场斗争的代表人物。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在全国形成的新文化思潮，对泰安地区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一些中学、师范和部分高等小学，成了传播新文化思想的重要场所，培养和教育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泰安的省立三中和师范等学校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新泰，以上层知识分子董香谷、曹汇源等为主成立的“新泰县新文化促进会”，在“山东省新文化促进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大力提倡白话文，提倡平民教育，宣传新道德，反对旧礼教，与旧文化的卫道士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又把宣传活动扩展到农村，在教育界广泛推行白话文，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县广泛展开。

在新文化思想影响下，泰安的文教知识界萌动着变革图新，争取民主自由，改造不平等社会的进步思潮。特别是 1917 年 11 月，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

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为他们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指出了胜利的方向。

第四节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在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之下，富有革命传统的泰安人民曾进行过无数次英勇的反抗斗争。

19世纪末，泰安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外国教会势力，组织了大刀会、义和团，与外地义和团配合活动，展开了反“洋教”斗争。1899年11月肥城县大刀会成员孟广文、吴方成、吴经民等在肥城与平阴交界的唐家宅子村附近杀死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引发了轰动省内外的“肥城教案”。1900年，平阴县义和团进入东平与当地大刀会会合，砸毁了大洼村、北辛庄、阎村的多处天主教堂，将教堂内的器物廉价卖给附近农民，对依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民愤极大的教民进行了处罚和抄家。此又称“东平教案”。两案虽因清政府屈从外国压力，偏袒教会，导致错误判决，但都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鄙视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抗精神。当地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错误判决无比义愤。不久平阴的义和团又多次攻打境内教堂，群众把清政府为卜克斯建的碑楼视为国耻，多次将其推倒。

民国以后，人民群众又对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